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佛山市党史资料汇编

(第五集)

人 物 传 略

革命斗争史展览说明

中共佛山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梁桂华烈士传略·····	(1)
陈铁军烈士传略(初稿)·····	(8)
忆陈铁军同志·····	(20)
记陈铁军烈士二三事·····	(22)
陈铁儿烈士·····	(23)
关于陈铁军、陈铁儿烈士的一些情况·····	(24)
蔑视死亡的笑 ——记张云峰烈士·····	(25)
区夏民烈士事略·····	(26)
勇敢的革命斗士,顽强的民族卫兵 ——吴勤烈士生平事略·····	(30)
人民永远怀念吴勤同志·····	(37)
革命烈士事略 陈应刚烈士 梁敬熙烈士 吴俭本烈士 梁梯航烈士 黄苏烈士 周侠生烈士 梁祖貽 烈士 刘乃谄烈士 黄海晏烈士 陈火生烈士·····	(40)
悼梁祖貽刘乃怡同志·····	(42)
梁祖谊烈士二三事·····	(44)
陈火生烈士简史·····	(45)
林锵云同志事略·····	(46)
圣堂岗革命烈士事迹简介·····	(47)
王寒烬、梁复燃先生事略·····	(50)
钱维方先生事略·····	(54)
佛山人民革命斗争史展览(文字说明)·····	(56)

梁桂华烈士传略

谢燕章

梁桂华同志是一位搭棚工人的儿子，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地区早期一名优秀党员，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副监委和香港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七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梁桂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他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本文是根据梁复然、罗珠、施展、谢仲雅等同志的回忆写成。记得一九六〇年梁复然同志对我谈了他和梁桂华烈士的一段革命友谊。梁复然同志还以解放多年仍未找到烈士的亲属深以为疚。后来，几经周折，他才从理发工人中打听到烈士的故乡。一九六四年十月间，我带着老同志的委托，去烈士家乡访问，见到了烈士的妻子严五，征集了梁桂华烈士在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前珍藏在家里的“农民运动特派员委任状”等文物。我回来后，受梁复然同志的嘱托，写了这篇传略，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事，由于各方面的客观原因，这篇稿写得很不全面，希有关同志给予指正和帮助。

一、从看牛仔到共产主义战士

一八九三年农历十二月廿一日，梁桂华同志出生在云浮县思劳乡三坑村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梁积是个搭棚工人，长年累月在港澳及国外漂泊谋生；母亲严氏，是个贫农，在家租佃一两亩田，种地兼打短工、打柴草度日。梁桂华从小跟着母亲劳动，给地主牧牛。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在外国搭棚摔死了，和父亲一起干活的乡亲把遗物——搭棚工具带回来，讲述了父亲摔死的经过和惨状，并谈到父亲摔死后，资本家连一个钱的抚恤金也没有发给，遗体也是工友出钱殓殓的。母亲闻讯，悲痛欲绝；而父亲的悲惨遭遇和资本家的残酷无情。也在梁桂华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创伤和仇恨。

梁桂华从小为人老实，忠厚勤劳，深得乡亲的赞许。但是自从父亲去世之后，连活路都断了，母子俩饥寒交迫，生活维持不下去，迫得桂华十四岁那年，不得不离开愁苦瘦弱的妈妈，在乡亲的资助下，由舅父携送到广州城学理发。可是当时的理发学徒，遭遇并不比看牛

娃好些。在学徒期间，他吃不饱、穿不暖，挨尽了老板的鞭打和老板娘的喝骂，受尽了人间冷暖，好不容易挨到了三年期满出师，辗转到佛山市当理发工人。梁桂华到佛山后，为了自卫和锻炼身体，拜了一间武术馆钟师傅为师，学习国技，由于他勤学苦练，师傅见他为人忠实，把自己的绝技全部尽传授给他，日子有功，几年内居然练得一身好拳术，成了钟师傅的高徒，他省吃俭用，几年内才积了二三百元，回家乡和严五结婚，婚后又回佛山，在永汉理发店当工人。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原来在佛山工作的梁复然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派回佛山宣传马列主义，发展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梁复然过去由于理发和学国技的关系，常到永汉理发店和钟馆，与梁桂华等工人有一面之交。于是首先在理发工人中物色对象。他向梁桂华谈论时局和宣传马列主义，彼此谈得很投契，交了朋友。自此，梁复然把一些马列书刊借给梁桂华看。梁桂华只读过两年书，文化水平不高，但在梁复然的帮助下，克服各种困难，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刊，并结合自身的经历，逐步明白什么是阶级压迫，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地主……等，觉悟到只有实现共产主义，劳动人民才能真正得到幸福的道理。梁复然还给他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情况，梁桂华听后问道：“人家苏联有共产党，我们中国不知道有没有？我能参加就好了。”梁复然见他已有入党的要求，就向他表明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梁桂华喜出望外，紧握着梁复然的手说：“那你就介绍我参加党组织吧！”

一九二二年春夏间，中共广东党组织负责人与梁桂华面谈后，批准了梁桂华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佛山市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参党后，他回顾了过去二十九年的牛马生活，一个被人看作“下九流”的理发工人，参加了自己的政党，这真是红日暖心头！他宣誓：为实现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

二、佛山市早期工人运动带头人

梁桂华同志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后，以永汉理发店工人为核心，联合了全市理发工人，成立了佛山市理发工会，梁桂华被选为会长。接着，他领导了理发工人七百多名进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结果以分配额40%增加到47%，取得了胜利。在旧社会，理发工人是被列为“三教九流”的“下等人”，理发工会的成立，并取得罢工的胜利，这是佛山市一件大事，对全市各行各业工人影响甚大。这时，梁桂华又配合梁复然在各行业中串连一批骨干，按照党的教导，去发动和团结广大工人，不久，佛山市制饼、建筑、鞋业、裱联、皮革等工会先后组织起来，还成立了佛山工人俱乐部，从而把佛山工人运动推向前进。

佛山市工人运动的发展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惧，以义仓值理为首的一班土豪劣绅，视梁桂华为眼中钉，他们借故开除了梁桂华，兼收买了一群流氓烂仔，煽动打群架，制造工人内部分裂，矛头指向理发工会。梁桂华是个武术精湛的拳击家，他团结起广大工人群众把前来寻衅的坏蛋打得落花流水，保卫了理发工会的安全，维护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使资产阶级的阴谋未能得逞。敌人恼羞成怒，遂勾结反动当局，由大地主陈恭受指挥团练局出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逮捕梁桂华同志，伪广东省法院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镇压工人运动，判梁桂华同志一年有期徒刑。

一九二二年冬，党组织派谭植棠和杨殷同志进行营救，梁桂华坐了半年的牢房，终于出狱了。半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梁桂华锻炼得更坚强，斗争更坚决，更多的工人群众团结在他的周围。

一九二三年初梁桂华同志出狱不久，党便派他去做吴勤的工作。吴勤，浑号“豆皮勤”，佛山大桥头人，曾拜钱维芳同志为师，学得一身武艺，他搜罗了一批青年农民和农村的游民分子，设立了鸿胜馆，称霸一方。那时，英帝国主义走狗大地主大买办陈恭受，在佛山拥有四十七乡民团，企图将吴勤收买，成立第四十八乡民团，以扩充他的实力。吴勤对此态度暧昧。是年七月，我党正领导制饼工人反对何合记为首的制饼业行商开除工人，提出保障工人生活，要求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斗争。这时中秋节近，工人罢工，没有月饼上市，何合记等饼商为将失去一个赚钱机会而急得团团转，后来，他们出了一个鬼计，妄图利用吴勤，在外地雇来工人，借吴勤的地方制饼，吴勤果然答允。正在这紧急的关头，钱维芳同志把吴勤叫去训斥一顿，接着，介绍梁桂华去大桥头，帮助吴勤走正道。

事前，党组织研究了争取分化吴勤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认为吴勤的本质还是好的，应该大胆去做转化工作。梁桂华同志到大桥头后，了解到吴勤出身贫苦而且是个孝子，决定首先做好吴勤母亲的工作。接着，他和吴勤促膝谈心，指出地主资本家利用吴勤的势力来破坏工人运动的目的和企图，他语重心长地说：“吴勤，你也是贫苦出身，难道你还未尝够失业的痛苦？……”提起失业，触动了吴勤的痛处伤疤，他终于醒悟过来，有力地支持了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条件，使罢工得到胜利。

接着，梁桂华又帮助吴勤认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吴勤的处境和出路，并指出：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是真正的出路。吴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认清当前的形势和处境，接纳梁桂华的意见，组织起南海县第一农团向南海县政府提出备案。南海县县长借口未经陈恭受同意，迟迟不批准农团的成立。延至一九二四年初，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实现了国共合作，成立了广东革命政府，佛山市国民党党部成立了农民部，我党派陈普铭负责农民部工作，南海县第一农团终于冲破国民党右派和当地恶势力的阻挠而建立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南海县农民运动的第一面旗帜。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决定调梁桂华同志来广州工作。从此，梁桂华同志就成了我党的专业革命家了。

三、到中山县开展农民运动

一九二四年七月，梁桂华被选送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习，并参加了黄埔军校举办的农民运动军事训练。十月，他和南海县第一农团军一起支援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不久，他在农讲所毕业后，便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在省内各地从事农民运动。年底，被派往中山县开展农民运动。

中山县是国民党右派势力比较雄厚的地方，姓氏宗派矛盾也尖锐复杂，进行农民运动是极其艰巨的。梁桂华带着理发工具，来到中山县九区上下栅乡，以理发为掩护，访贫问苦，进行深入发动群众。他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紧紧地依靠当地农民，用农民的语言，和贫苦农民沟通阶级感情，逐步地建立起阶级队伍。农民运动起来以后，地主豪绅非常仇视，他们派出狗腿进行破坏。这时，梁桂华同志挺身而出，以特派员的身份向土豪劣绅展开有理有节的斗争，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来为农民辩护。通过梁桂华同志艰苦深入的发动后，农民组织起来了，建立了上下栅农民协会和九区农民协会。为了扩大影响，中山县九区农民协会成立那天，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廖仲恺先生和彭湃同志等都参加典礼，并在大会上祝词。通过这个大会，打下了中山县反动民团的威风，为进一步发展中山县农民运动和后来省港大罢工封锁香港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五年五月，全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梁桂华同志以省农协代表和佛山工会联合会代表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大会。

四、在省港大罢工的日子里

一九二五年，梁桂华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副监委，成为杨殷同志的得力助手。他以大公无私，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与一切不良现象作不调和斗争；对犯有错误的党员，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

有一段时间，谭平山听到国民党右派要行刺革命派首领的情报，吓得心神不定，为了自己的安全，擅自把武术精湛枪法准确的梁桂华调到身边当卫士队长，陈延年同志知道后，在党组织内批评了谭平山。后来还是梁桂华亲身到佛山找来两个武术师，给谭平山当卫士。其

中一个万师傅，过去在佛山市曾被豪绅利用，扬言要打倒梁桂华。对此，梁桂华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后来，万师傅被资本家利用，要来破坏佛山市工人运动，干预佛山工会联合会的筹备工作，梁桂华请示组织后，决定以个人名义去“踢馆”（按系大闹武馆之意）。这天，梁桂华来到万馆，向万师傅请教武术，万师傅身材高大气壮如牛，不把梁桂华放在眼内，听说梁桂华来请教武术，自以为得意，谁知一交手，就被梁桂华一下子把他打倒在地，万师傅领略了梁桂华的真功夫，对梁桂华信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梁桂华晓以革命大义，介绍他当谭平山的卫士。

一九二五年，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了“五卅”大屠杀后，中共广东区委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时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宣言，号召香港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反帝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会为了实现这一罢工，派了杨殷、杨匏安、梁桂华等十多位同志到香港，协助邓中夏同志做组织发动工作。这一时期，梁桂华一方面作为邓中夏同志的得力助手和保卫人员，担负党内部分同志的联系工作，贯彻党团政策；一方面他还单独负责发动一批基层工会，如理发等行业工会的基本群众参加罢工。工作特别忙，尤其是到六月十九日，大罢工全面爆发以后，为了接待和安置从香港回到广州来的群众，党派梁桂华任省港罢工委员会深圳接待站主任。这期间，他不辞劳苦，从深圳附近的农会借来大批台椅、床板，还亲自为罢工工友铺床，甚至把自己的床铺也让给同志们休息，由于他事事亲力亲为，深深地感动了罢工归来的工友，受到广大工人的爱戴。当时在罢工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入党，党组织为了工作需要，并满足这些同志要求，决定在罢工工人中吸收新鲜血液。梁桂华坚决拥护党的决定，积极热情地在工人中进行发展组织工作。本来，梁桂华文化水平较低，平时也不大喜欢讲话的，但自从他参党以来，经常注意政治和文化的学习，不断提高了理论水平，所以在这次发展组织的工作中，他和许多领导同志一样，在大会上演讲，以生动活泼而又为工人所熟悉的语言，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以切身的体会结合自己的实践来说明无产阶级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获得彻底解放，使他所负责的基层工会积极分子受到深刻的党课教育，纷纷要求参党。梁桂华同志为省港大罢工中党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战逆风斗恶浪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前夕，国民党右派阴谋在大会期间暗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广东区党委获得情报后，为了确保我党出席代表的安全，派杨殷同志组织特别保卫大队。

杨殷同志与梁桂华、梁复然等同志去佛山和南海等地，挑选了四十名身强力壮，精通武

术，受过军事训练的党团骨干，集中在省农民协会，日夜训练，杨殷任特别大队队长，梁桂华、梁复然、周侠生分任小队长，还有钱维芳、陈克武、谢仲雅等一批骨干。一九二六年一月，杨殷同志带领着这班雄纠纠的武士，向大会秘书长吴玉章报到后，就分批分班守护在会场内外，镇慑了右派的活动，保证了与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安全。

一九二六年底至二七年初，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甚嚣尘上，从各方面的迹象表明，国共分裂只在旦夕，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使我党在形势逆转面前失去了武装反击的力量。在这严重时刻，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保存革命力量，广东区党委委派梁桂华同志任香港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到香港建立一系列的秘密机关，为党转入地下活动作好准备。在省港罢工期间，由于梁桂华曾在公开场合露面，不少人认识他，因此，梁桂华到香港后，十分注意隐蔽，化装潜伏。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制造了流血的“四·一五”事变。国民党到处逮捕共产党人，他们还派出特务暗探到香港，勾结英帝国主义，跟踪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叛徒的出卖，梁桂华设立的机关被破获，梁桂华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严刑拷打，动用了各种刑具，甚至用铁锤打断了梁桂华同志两根肋骨，还是得不到半句口供。梁桂华同志在狱中饱受了肉体上的折磨，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但并不向敌人低头，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的革命气节。党知道梁桂华被捕后，派杨殷同志营救，聘请了律师，为梁桂华辩护。最后由于香港反动当局得不到任何证据，只好把梁桂华同志递解出境。杨殷及时把梁桂华引渡到澳门，使梁桂华安然脱险。然而，梁桂华的身体已被折磨成残废。

六、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八·七”会议后，广州正酝酿着起义风暴。梁桂华同志从澳门返回广州，他身残志不残，早已决心把七尺之躯交给党，身体还未复元，又投入了新的战斗，配合周文雍同志组织和改编工人赤卫队，周文雍任赤卫队总指挥，梁桂华任副总指挥。还负担筹款和建立弹药运输站等秘密机关。为了筹款，他回到了家乡云浮。

梁桂华同志自从参党后，仅回过二次家。第一次回家约在二年半前，是他当了“农民运动特派员”后，回家去动员妻子到广州来参加革命的。他的妻子严五，因为感到自己没有文化，出来工作有困难，而且城市生活又不习惯而拒绝了，梁桂华自己回广州继续工作。不久他收到妻子来信，知道女儿金云出世了，十分高兴。但革命工作为重，他不能回去照料，只托人带了三十元给妻子，这样，抚育女儿的责任就全靠妻子严五了。这一次回家，距离上次回家又已两年多了，瘦弱的小女儿已经会走路，但家庭在离乱中生活更加贫困。梁桂华是为革命回来筹款的，但上那儿去筹呢？有钱人家不会拿出钱来，贫苦人家则有心无力。梁桂华

的心中，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他决不会空着双手回来，他横下一条心，在回家的第二天，就把祖屋一间以白银四百元典给了同村兄弟梁甲。临走前，把“农民运动特派员委任状”及“黄埔军校军事训练”的证书交给妻子，嘱咐妻子说：“这两件证件比生命还要宝贵，你要谨慎收藏，切勿在人前露眼，除非是共产党建立了人民的天下……。”他还嘱咐妻子担负起金云的抚育责任。就这样在家过了两三天，带着典屋得到的白银回广州去了。

七、浩气长留在人间

他回到广州后，立即按照党组织的计划托人担保，在小北直街开了一间“大安”米店，以卖米为掩护，作为存放暴动用的枪枝弹药仓库，弹药的来源有从南海九江运来的炸弹。当时梁九同志在九江秘密设厂试制，然后由李少棠秘密运来广州；也有陈铁军同志打扮成贵妇人，坐着轿送来的枪枝；还有教导团秘密送来的手榴弹、来复枪……等等。这些枪枝弹药运到米店后，又通过卖米的形式，一包包地转运到各个起义队伍。梁桂华同志日夜不停地参加各种会议、联系工作、检查准备情况等，熬得眼睛都红了，同志们劝他多休息，他只笑笑说：将来总会有时间休息的。

广州起义的前两天，由于搬运人员不小心，米包露出了子弹，被敌人跟踪破获，梁桂华于仓促间在后墙逃脱，并立即把情况报告了起义指挥部。

这时，汪精卫在上海获悉广州将要举行武装暴动，立即来电要张发奎武装镇压，四军军长黄琪翔也急忙由西江赶回广州，准备镇压革命。广东省委鉴于情况急剧变化，决定提前起义，把起义时间改为十二月十一日。

十日，梁桂华同志参加了禺山市由叶挺、杨殷同志召开的紧急战斗部署会议，根据会议的决定，他参加了敢死队。十一日起义开始时，他和敢死队的同志一起攻打公安局，占领了公安局后，他立即转到长堤电厂一带指挥工人赤卫队，坚守长堤阵地。十二日，机器工会体育队的工贼流氓，在帝国主义的兵舰掩护下，企图在电厂一带强行登陆，梁桂华身先士卒，和敌人在阵地上肉搏，受了重伤，同志们送他到附近的韬美医院留医（韬美即现工人医院）。

十三日，刚建立起来的广州苏维埃政权，被敌人摧残了。梁桂华同志不幸被机器工会体育队搜捕，在韬美医院门前，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梁桂华烈士牺牲五十多年了，他那崇高的共产党员品德，奋不顾身的英雄形象，浩然正气，却永远长留在人间！

（原载《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

陈铁军烈士传略

(初稿)

一、封建叛逆的新女性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同志,于一九〇四年(光绪甲辰年二月廿三日)生在具有反帝爱国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省佛山镇,祖居在善庆坊三十一号(现6号)的一座深门大宅院。铁军的祖父陈超贤,原籍广东省台山县三合黎洞汇洞里人,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二年(清代),因封建械斗逃到佛山落籍。初以经营豆腐为生,后因生活所迫,旅居外国经商,先后在佛山买下店铺三间、大屋两间和桑基、鱼塘十二亩多等产业。铁军的父亲陈帮楠,承管父业,有子女八人。铁军排行第四,铁儿排行第七。铁军姐妹俩自小就生活在这个封建家庭,是一双富家闺秀,年仅十三、四岁的小铁军,就练得一手能针善绣的好手艺,至今仍留有她的针线物和刺绣品。

铁军的童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正是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向旧民主革命的年代。反封建、反压迫,提倡男女平等的时代呼声,唤醒了这位温柔而刚健的小姑娘。她十分渴望与男孩子一样,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去见识新时代,接受新的知识。虽然,陈铁军生长在一个封建礼教十分浓厚、管束很严的商人家庭,但是,在当时社会潮流的影响下,她不甘于深居闺房,拨弄针线,虚度年华。她本着男女平等的思想,坚决要求父兄准其读书识字。铁军十五岁那年(即一九一九年),终于进入了佛山坤贤私塾(即红星戏院对面,原叫石路头的地方)读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席卷佛山这个小城镇。一支以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郭鉴冰(佛山人,终身教师,退休后于一九七七年死)三姑侄的“五四”运动宣传演讲队来到佛山。她们把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带到各个旧学堂,并在街头演讲。陈铁军带着小妹妹听了演讲,看了传单,心中燃起了一团火。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小铁军,开始不满于“之乎者也”的旧学堂,十分羡慕那些演讲的姐辈们有见识和知识。不久,铁军拉着铁儿的手,大胆地走上街头,参加了当时受“五四”学生运动影响的佛山爱国示威游行。接过革命的传单,到祖庙附近散发。

二、年少志豪的女学生

一九二〇年间，郭鉴冰等三姑侄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佛山创办了第一间新学制的“季华两等女子小学校”（现佛山市第二小学的前身）。当铁军知道该校的校长和老师是当年“五四”运动的演讲者时，她便串同了七、八个女同学，毅然冲破家庭的束缚，成了这间新学校的第一批高小学生。铁军带头穿上学生制服，参加体育锻炼，并以她刻苦学习，国文（即语文）成绩特别优秀，是该校品学兼优的高材生的实际行动，支持了这间遭人白眼的新型学校，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和旧眼光，揭示了女子要读书，女子不比男子弱，男女要平等的道理。这是年少志豪的小铁军，又一次冲破封建思想、家庭束缚的胜利。

铁军在季华小学还未毕业，封建包办婚姻就向小铁军袭来。年仅十六岁的铁军，由父母作主，被许配给佛山盲公饼何合记的太子爷何应雄为妻。当年，铁军的父母相继去世。次年，十七岁的铁军，高小还未毕业，何合记的老板何舜门病重，急于迎娶铁军过门“冲喜”。在男家催婚，大哥迫嫁之下，铁军无奈地提出“父母大孝在身，只能举行婚礼仪式；婚礼过后，仍要继续读书等两个条件，在得到男方的同意后，才勉强地举行了婚礼仪式。洞房之夜，铁军发现新郎是个弃文学武、庸俗不堪的小老板，“三朝回门”便在娘家住下。只在头一、两年，逢年过节才去婆家行礼，后又回到学校读书了，这个期间，郭鉴冰订有一本“××潮”的新杂志，铁军经常借阅，新思想就灌入了她的心。这样，铁军刻苦攻读，直至季华小学读完高小。

三、探求真理的青年

铁军的意愿是：读完小学，上中学，考大学，将来在社会谋职业，不依赖别人过寄生生活。因此，她根本不理这门可悲的包办婚姻。一九二二年春，十九岁的铁军，在不求婆家的供给，又断了娘家的供养之下，依靠变卖自己陪嫁的首饰，只身到广州私立坤维女子中学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插班。坤维女子中学是一间旧封建、旧思想十分浓厚的“小姐”学校，不少女同学务虚荣，爱打扮，寄望将来嫁个如意郎君，享福一世。对此，使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陈铁军十分反感。正当铁军苦闷、徬徨的时候，该校教员、中共党员谭天度同志，发现陈铁军是个勤奋好学、追求真理的青年，就指引她和几个进步同学组织了“读书会”，介绍一些共产主义书籍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响导》、《新青年》和《政治周报》等刊物给

她们阅读，讲解中国的社会现状，解释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等。有一次，陈铁军问谭天度同志说：“我能参加中国共产党吗？”谭只作会意的微笑。后来，谭天度同志有意识地介绍陈铁军认识了当时妇运领导人蔡畅和邓颖超同志。不久，铁军又与几个同心的同学组织了“时事研究社”，经常讨论国内、国际的政治变化，研究中国的社会现状，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从此，铁军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的思想，不断寻找中国人民和妇女真正解放的道路，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热心探求真理的新青年。

四、铁了心肠献身革命

一九二五年秋，铁军在广州坤维女子中学初中毕业。由于她奋发向上，学业成绩特优，考入了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即现在广州市鲁迅纪念馆址）文学院予科就读。当时的中山大学，是中国政治派系斗争非常激烈的地方。代表左派的有“新学生社”，代表中间派的有“民权社”、“知用学社”，代表右派的有“国家主义派”、“孙文主义学会”等，代表进步妇女组织的有“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中大支会”，代表资产阶级妇女的有“女权运动大同盟”。面对复杂的政治派系斗争，陈铁军曾一度处于极端苦闷之中。与此同时，由于多年自给读书，铁军的陪嫁物已变卖一空，只剩下一张床蚊帐和被子，经济上也处于极度困难。当时，铁军的家里又适逢家道中落，更不好向家里求助，这是铁军最为徬徨的时刻。有一次，铁军十分苦恼地回到佛山，对季华小学的老师郭鉴冰说：“中山大学的政治派系斗争很复杂，我处在四面包围之中。为了避免上当受骗走错路，我一直在作政治上的选择。不过，看来看去，还是共产主义能够解放全人类，也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为了应付读大学的高昂学费，铁军曾三次向郭借过钱。然而，铁军没有被困难吓倒，在一些进步同志、共产党员的影响和指引下，逐步辨明了真伪，坚定地站到了左派一边，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的活动分子。

陈铁军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从党的刊物《响导》、《新青年》中吸取精神力量，通过校内各种辩论会、讨论会、个别谈心等形式，在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贯彻党的主张，揭露和批判右派学生的各种谬论。有一次铁军参加了关于中国应该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的辩论会，铁军的态度是非常明确和积极的，坚定地回答：中国要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对待妇女解放的问题上，铁军又同“女权运动大同盟”的“非流不”（非外国流学生不嫁）分子陈逸云等，进行了一场大辩论。铁军揭露了“女权运动大同盟”勾结西山会议派破坏反帝运动，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面目，批驳了她们的“目前妇女运动展不开，主要是女界中无人材”等谬论，指出了只有积极参加反帝反

封建运动，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后消灭阶级，妇女才能彻底解放的道理。还有一次，左派学生召开群众大会，右派学生组织中的“土的党”在会场捣乱，哄散群众。但群众不走，那些“土的婆”的女学生就煽动吵架、打架。铁军奈不住了，带了几个女同学与那些“土的婆”打起架来，把她们赶出了会场。陈铁军坚决斗争的精神，右派学生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共产婆”。

由于国共合作，广东成了革命的策源地，广州的革命气氛更是活跃，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空前高涨。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爆发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六·二三”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陈铁军与同学们冲出了中山大学的校门，加入了示威游行的队伍。由于反动派勾结英、法帝国主义，从沙面租界和沙面河战舰上开枪开炮，惨杀示威群众，炮制了闻名中外的“沙基惨案”。在这次示威游行中，陈铁军亲身感到群众的伟大力量，亲眼看到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血的事实教育了她，使她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成功，妇女要解放，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因此，铁军更坚决地投入了反帝爱国的革命斗争行列。

在斗争中，铁军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逐步锻炼成长。一九二六年四月间，由区梦觉介绍，陈铁军在中山大学文理学院党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陈铁军同志就铁了心肠跟着党走，革命到底，毫不妥协。为了表示跟旧我决裂，她把原名陈燮君，改为陈铁军，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陈铁军同志入党后，工作更积极，斗争更坚决，被中山大学党总支、中共两广区委定为党内的活动分子，经常参加党的会议。一九二六年的冬天，铁军同志被选任为党支部委员，负责组织女工运动和工人家属的工作。在省港大罢工期间，陈铁军同志响应党的号召，到罢工工人家属中去活动，教识字、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家属积极支援男工友的罢工斗争。铁军同志初到工人家里，总觉得工人家属对她很客气，却不亲热。回来后，她暗自意识到：自己从思想上、生活上和外表上都与工人家属有距离。于是，当她再到工人家属里去时，先脱掉自己喜爱的没领子直襟衫，黑长裙子，连胸前别的一支自来水笔也摘了下来，换上黑布大襟衫，阔脚裤子，头发也改梳了，打扮得象个劳动妇女的样子。当她走进工人家里，就象自家人一样，扫地、洗擦、带孩子，帮搞家务，样样都做。有空就给工人家属读报纸、讲故事、宣传革命道理、教识字、教唱革命歌曲等。铁军同志本来不大爱说话，但一到工人家里，她的话就多起来了，有说有笑，工人家属都喜欢她，亲近她，把她当作自己人。一个工人家属高兴地回忆说：“当年，铁军同志就是我们工人家里的人，是我们工人群众心里的知心人呀！”

一九二七年春，陈铁军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委员，并担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后为常委、副主任）。同时，又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劳工子弟学校当教员。陈铁军同志一面读

书，一面工作。每天既要上课，又要讲课，还要办公，参加会议，任务十分繁忙。有一段时间的晚上，她还要主持办一个“广东妇女干部训练班”，训练准备到农村去工作的妇女干部。党派陈铁军同志负责这个训练班的工作，她就亲自给学员上课和参加讨论。她经常教育学员将来到农村去，要十分同情农民的痛苦，生活要群众化，不要摆知识分子架子，不能拿着笔记本子当面记她们的说话，她们才会给你讲知心话。我们时刻不要忘记工人、农民，妇女运动如果脱离了女工和农妇就没有力量，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就不会成功等等。铁军同志还善于以启发式诱导学员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和认识问题。有一次她出了一个有趣的题目：

“你心里最敬仰的是什么人？”让学员们各抒己见，上台发言。有的说最敬仰的是岳飞和关羽，有的说孙中山，有的说列宁。最后，陈铁军同志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她说：“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古今伟大人物的高贵品质，英雄气概。”她又特别介绍了列宁的为人，指出列宁对世界革命运动的伟大贡献。这场讨论轻松活泼，使受训学员们的印象很深。陈铁军同志不仅在思想上重视做工农群众的工作，而且决心和工农在一起干革命。她对党号召深入农村去工作，早已有准备。铁军同志留了又黑又浓的一头长发，讲起课来满头大汗，有些学员劝她剪个时髦的短发，铁军同志摇头说：“热一点不要紧，剪了短发，将来到农村工作很不方便。”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了革命，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四月十五日，广州也跟着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敌人大批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日凌晨，反动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时，点着名要捉陈铁军。住在中山大学铜乐楼后面女生宿舍的陈铁军同志，被女校工沈卓清从睡梦中叫醒，翻过围墙，逃出了中山大学的校园。铁军同志想到：已经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邓颖超同志，处境十分危险。于是，她自己化妆成贵妇，沈卓清陪作佣人，前往广州市柔济妇产院，通知当时难产住院的邓大姐离开广州赴香港，脱离了险境。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艰险日子里，铁军同志一时找不到党组织的关系。其他一些同志对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不知所措，铁军同志就劝告那些暂时失掉党的关系的同志要有信心、乐观和沉着。她说：“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要沉着镇静，要有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革命一时受挫折，对我们是个考验。现在我们要耐心等待时机，争取斗争的有利条件，胜利终有一天会来的。”铁军同志一面寻找党的关系，一面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她经常转换住处，生活很不安定。铁军同志的三哥陈仰之知道后，就以兄妹之情相劝说：“你成天搞工会工作（那时三哥还不知铁军同志加入了共产党），东躲西藏，住不安，食不饱，若是被捉了去，更不得了呀！你还是听我的话，规规矩矩回学校去读书吧！我供你读到大学毕业，只要你愿意，送你出洋留学也可以。”但是，铁军同志早已下

了革命到底的铁心，三哥的话，一点也动摇不了铁军同志的钢铁意志。

五、光辉的战斗历程

大革命失败后，党转入了地下斗争，那时党的省委领导机关已从广州迁移到香港。陈铁军和其他一些同志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党。当党组织知道她的消息后，便通知她到省委机关。八月间党又派她回广州重新建立机关，掩护同志，当交通、印、送、写宣传品，秘密运送武器，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党派周文雍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广州继续领导工人运动，秘密建立工人暴动委员会，在人力车工人、炸药工人、车衣工人中加紧进行组织教育工作，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为了工作的需要，党派陈铁军协助周文雍同志工作，他们合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机关。为了便于掩护，他俩住在一起，对外假称夫妻，陈铁军十分谨慎对待党交给的这个重大任务，一直和周文雍同志配合得很好。表面上周文雍打扮成一个金山阔少爷，在街坊邻里的眼里，陈铁军自然是一个高贵的少奶奶了。他们时常在灯下细语谈论工作并机警地利用书包秘密运送武器，巧妙地做交通联络工作。由于得到陈铁军的很多帮助，周文雍对她是十分敬重的。久而久之，周文雍同志心里热爱着她。周文雍同志对党忠心耿耿，非凡的教育、组织工人群众的才能，对革命工作不怕困难，不避艰险的伟大气魄，以及从不因个人私事而影响工作的精神，都使陈铁军十分敬佩。虽然他们的感情很好，但当时的革命工作和艰险的环境，使她对周文雍不表示爱情，一直只保持着同志间的关系。

在这些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实行残酷屠杀和野蛮压迫。解散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成批的罢工工人被调散，逮捕工人领袖，对游行示威的群众进行镇压，开枪射击，并命令黄色工会的“改组委员会”占据工会会址，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用武力驱逐粤汉铁路工人，搜查和破坏一切革命的人民团体。可是这一切横蛮手段是压不住工人大众的斗争热情的。二七年十月间，广州掀起了反军阀、反压迫、反屠杀的斗争新高潮。有一天，陈铁军同志在广州市东皋大道进行讲演，吸引了不少群众，铁军同志以高亢的声调，有力的手势，痛斥了反动军阀镇压工人群众的罪行，博得了在场群众的阵阵掌声，反动军警前来包围，把主持街头演讲会的同志捉去了，陈铁军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脱了险。周文雍根据党的指示，继续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为了揭露汪精卫、张发奎反动派的两面派面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周文雍带领工人群众向汪精卫请愿，包围了东山葵园汪精卫住宅，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对工人的屠杀与迫害，结果被反动派拘捕了，把他关进了监狱。

为了营救周文雍同志，党安排布置了严密细致的劫狱计划，决定让陈铁军住在一个工人

的家里，共同筹划进行这项工作，确保劫狱计划成功。他们首先向监狱看守人做工作，派了一个忠实机警的同志和这个看守人混熟，每天和他一起逛街，上茶楼饮茶，渐渐同这个看守人交上朋友，从中打听消息，得知周文雍同志被捕后受刑很重，宁死不屈。陈铁军通过党的关系，又派中山医院女工陈小燕（原是沙面洋务工人），以济难会的名义和冒认家属的关系，每天给周文雍送食物。一方面通知周文雍在监内声称自己肺病复发，病情严重。另一方面，每天送姜炒饭、酥炸鱼、烧排骨等一类的东西给他吃，并暗中吩咐不要喝水。这样不几天，周文雍同志便发起高烧，说起呓语来了。同时通知狱中同志，乘机来一次骚动，不管白天黑夜，在监内大吵大嚷，说周文雍同志是患了“回归热”病，会传染人，弄不好大家都会死。还指责监狱当局犯人病得那么严重不送医院治疗，太不人道了，等等。与此同时，陈铁军又在外活动群众和医生搞好关系，给医生送了厚礼，于是医生也证明周文雍病情严重，非住院不可。由于公愤难平，反动头子迫于无奈，只好同意送去医院。这样，便有计划地争取到周文雍同志住进了九曜坊的市立医院。接着，陈铁军和同志们又布置一个群众假装病人，入市立医院靠着周文雍同志的病房住下，并派一些人装作病人家属去探病，从中打听消息，和周文雍约好逃走计划。一切安排就绪后，在劫狱前的一个晚上，汽车工会派了一个可靠而又技术好的司机徐惠东，按照原定时间将车开到医院门口，几个工人跳下车来，一人用枪指住站岗的警察卫兵，缴了他们的枪，把他们捆绑起来，其他几个工人直奔住院病房，立即把一个蒙着白被单的人背出了医院，马上上了汽车，这时司机便开足马力，飞快地离开了医院，从永汉路往东经红花岗直奔沙河，在一间农民的草寮前停下来。就这样周文雍同志得救了，又同陈铁军重逢相会了。大家都万分高兴，互相庆贺劫狱成功，同志们都称赞陈铁军做事机警沉着，勇敢细致。第二天早晨，报纸上纷纷登载了一条用特号标题写成的重要新闻《无牌小汽车，劫走周文雍》，轰动了广州全城。以后，因革命的需要，党决定他们两人在广州仍作假夫妻同住机关。陈铁军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生命的安危，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四·一五”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广州城。但是，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州工人阶级，经过省港大罢工和支援北伐战争的严重考验，提高了觉悟，加强了组织性。那里有压迫，那里有反抗，工农群众对反革命压迫的反抗越加表示坚决，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行动起来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组织起来并武装自己。十月十四日爆发了广州海员大罢工，他们公开拥护自己的革命工会和共产党，抗议反革命的屠杀，得到了各业工人的援助，举行了工人大示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又举行盛大的群众纪念大会。各行业的工人相继组织起来，并自动武装自己。市郊的农民也举行了秋收起义，郊区驻军的士兵也不满军阀统治，秘密组织了革命士兵委员会，纷纷要求起义。在这种

革命洪流滚滚的形势下，省委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轰动全世界的广州起义。经过同反动派的浴血奋战，建立了历时三天的工农民主政府。

起义前夕，周文雍和陈铁军的工作十分繁忙，也特别紧张。周文雍任两千名武装起来的工人赤卫队的总指挥，这是一支广州起义的主力军。陈铁军那时在广州市委工作，又是周文雍的联络员。她为武装起义做了许许多多的准备工作，劳碌奔波，废寝忘餐，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她到处筹集起义经费，还冒险回佛山家里要钱，利用合法身份，乘坐青衣轿秘密往返运送枪支弹药，组织女工到广州和外地商店购买“神红布”，用来赶制红旗、红领巾、红袖章，做起义的标记。在广州苏维埃的这面红横额上，有着她亲手缝过的针线。此外，周文雍同志分配她去做交通联络，和工人接头，运送枪枝，印发传单，写标语等等。十一日，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家都焦急地等待起义的讯号。晚上十一时，第四军教导团在小北门外的四标营打响了，工人赤卫队在周文雍同志的指挥下，直奔当时广州的反革命政治和军事中心——伪广州市公安局，英勇的工人和士兵经过顽强的战斗，在黎明前攻占了伪公安局，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当时，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伪公安局里，张太雷、叶挺等同志忙着在那里指挥作战，周文雍在这里继续指挥工人赤卫队，陈铁军忙着给工人发枪枝，发钱给人买东西吃，东奔西跑，忙个不停，可是她自己连一口水也未喝过。翌日的早晨，太阳初升，红光照遍了大地，整个广州城都沸腾起来了，人们喜气洋洋，气象焕然一新。马路上走着成群结队雄纠纠的起义军和工人赤卫队，他们脸上浮现着兴奋而又严肃的神情，准备继续战斗。共青团员、劳动童子军出动工作，他们唱着战斗歌曲，热情地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市民做宣传。妇女们有的拿着篮子到茶楼去买点心给起义军吃，有的做救护兵员的工作。大街小巷上到处贴满了革命标语、传单。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陈铁军带着周文雍的指示，到东堤八旗会馆，同起义的警卫团联系。因当时该团向周文雍同志要翻译（因他们不懂广州话），要汽车司机，还要求把靠近他们左右驻地的赤卫队交给他们统一指挥。陈铁军用最快的步伐来到了八旗会馆，根据周文雍的指示，帮助起义的警卫团布防，并传达周文雍的指示说：“请警卫团留些队伍，但任东堤的警戒。”接着和该团的连长一起，从东堤到大沙头布防，解决问题很明朗坚决，对士兵又是热情鼓励。当时有些士兵对驻防地点有意见，不肯立即移防，陈铁军就斩钉截铁地说：“现在不是讲价钱的时候，只要听起义总指挥的话就没有错。”他们很佩服陈铁军做事坚决果敢，于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命令，立即移防了。

十二日那天正午，在西瓜园开过了庆祝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之后，领导起义的张太雷同志不幸在指挥巷战时被敌人枪弹击中而牺牲了。这是对革命的莫大损失。起义胜利